

# 联合国 大会



Distr.  
GENERAL

A/41/83  
10 January 1986  
CHINESE  
ORIGINAL: FRENCH

第四十一届大会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1986年1月7日

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塞内加尔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秘书长致意，并谨向他通知如下：

塞内加尔决定将塞内加尔共和国国民议会前的塔舍尔广场更名为索韦托广场，连接该广场的大街更名为纳尔逊·曼德拉大道。

值此广场和连接广场的大道重新命名之际，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阿卜杜·迪乌夫先生阁下发表了讲话。讲话稿随函递送秘书长。

塞内加尔共和国常驻代表团谨请秘书长将讲话稿作为题为“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议程项目下的一份大会正式文件散发为荷。

86-00687

附 件

纳尔逊·曼德拉大道和索韦托广场命名仪式

达喀尔，1985年12月6日

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

阿卜杜·迪乌夫先生

阁下的讲话

纳尔逊·曼德拉、索韦托、同胞们：

在种族隔离制度的领土这座集体牢房中，在位于孤岛、与世隔绝的监狱里，纳尔逊·曼德拉堪称在三重监狱中渡过了过去的20年。

但是，至少他的名字未被监禁。当然，这个名字在南非是被禁止的，但是，在那里许多黑人用“伟大的黑人领袖”作为它的代名词。难道二者不是高殊意同吗？

作为不仅是黑人，而且是全人类斗争、尊严和希望的象征，纳尔逊·曼德拉名扬天下，著称于世。

所以，我们认为，以此光荣的名字命名塞内加尔首都的一条主要街道是我们国家的荣誉。

我们还应该纪念在索韦托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以我们自己的方式使其永世长存：用索韦托命名人民会堂——塞内加尔国民议会前的广场。

今天，我们必须透过表面，思考曼德拉的英雄的一生。

事实上，许多因素使“伟大黑人领袖”先倾向于投入反抗“种族隔离”的战斗生涯。

“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后来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成立7年之后，1918年曼德拉出生。他生在特兰斯凯的贵族家庭，是滕布酋长的长子。各酋长本人均参与成立国民大会。完成法律修业之后，二十六岁的纳尔逊·曼德拉于1943年成为青年联盟的一名成员；1944年成为南非人民大会的成员。翌年，1945年，南非人民大会达到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该大会使章程更为民主化，并通过坚决的民族主义政纲，要求实现普选制、黑人拥有土地的权利、自由迁徙和法律面前平等的权利。

1952年，南非人民大会决定发动抵抗运动，反对非正义的种族隔离法，尤

其反对禁止黑人不带通行证在本国境内通行的法律。 一万志愿斗士将有意漠视这一法律。 纳尔逊·曼德拉被指派为“全国志愿者司令”，负责挑选参加运动的人和指导有纪律的行动。

当权者不久便做出反应：施行鞭笞刑罚，甚至殃及妇女。 所谓颠覆性集会遭到禁止。 颠覆被解释为“可能引起联邦的欧洲人和联邦人口其余部分之间敌对情绪的任何行动”。 这样说来，颠覆之罪归根结蒂岂不在于种族隔离制度本身？ 尽管如此，艾伯特·卢图利和某些南非人民大会领导人，其中包括纳尔逊·曼德拉依然被终身禁止参加南非人民大会的公开集会。

然而，1955年6月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克利普敦举行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集会上，各种族的3,000名代表通过了自由宪章。 宪章以命令句形式出现的10项条款（“人民得管理国家”、“各民族得享受平等权利”、“耕者得分田”……）字里行间已经为一个民主博爱的南非描绘了略图。

这一时期，纳尔逊·曼德拉的活动转入秘密，他挨家挨户登门，努力扩大队伍，巩固南非人民大会的地下组织结构。 当时必须选择标语，广为传播，而不组织大规模会议或印写传单，避免透露风声。 在这方面，曼德拉组织计划的走街串巷，（挨家访问）的技巧证明非常宝贵。

“影子军”虽然还处在萌芽状态，但却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对抗奠定基础。

但是，这样的斗争升级注定要遭到种族主义政权的严厉报复。 自1956年晚些时候起，在比勒陀利亚开始了漫无止境的审讯。 主犯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28名非洲领导人因参与外国策动的阴谋活动而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出庭。 真正的理由是他的组织在煽动罢工活动。 他对这一拙劣可憎的罪名所做的答辩将作为捍卫黑人利益的一座不朽丰碑载入史册。 这些领导人无畏和无可指责的行为在激起对镇压者的愤怒过程中必然赢得人民大众坚定不移的忠诚。

正因为此，1960年泛非主义者大会领导人罗伯特·索布克威毁掉护照自首、

南非人大会议领导人公开烧毁身份证的举动成为等待已久的信号。数千非洲人效仿这些和平反抗和拒绝作为白人棍棒下哀叫的羔羊而生存的举动。在沙佩维尔，非洲人踊跃参加示威，抗议使他们在自己国土上受屈服、受凌辱的法律限制。他们的示威是有分寸的，他们唯一的武器就是他们的真诚及合法权利。比勒陀利亚的法西斯政权所做的反应是众所周知的：对人群开枪，造成69人死亡，约200人受伤。

只有回顾自从1952年布尔人的近百名先人被东印度公司赶上岸，为航经好望角的船只维持一个中间补充站这段动荡的历史，才可能充分解释布尔领导人的残暴。他们很快受到英帝国主义和先已存在的非洲人民力量的两面夹击。但是，后者不久被火器击败。1938年12月16日血河之战，丁干的祖鲁人在大屠杀中损失3,000人，而布尔人仅有3人受伤。这一小集团人无需更多的借口来歪曲圣经，自称为上帝的选民，负责引导黑人走向“进步”，而这一进步的条件，无需赘言，便是由他们统治。

由此产生了对蔑视和剥削的愤怒。由此产生了影响到这一小集团被空间和时间遗忘的乡村人的一种长期精神变态，一种名符其实的迫害变态心理，包括惧怕遭到所有人的迫害，尤其是迫害弱者的狂虐。这能说明为什么会出现沙佩维尔——耗尽一切的恐惧的结果。

以后斗争变得异常艰苦。南非人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均遭禁止和取缔，领导人转入地下。正是此时，建立了政治运动的军翼；在此之前曾最后一次郑重呼吁当权的白人举行一次国民大会，除其他事项外，解决比勒陀利亚政权单方面宣布成立南非共和国之后的宪法问题。比勒陀利亚的统治者毫不犹豫地把共和国的名称与制度化的种族主义联系起来，褻渎了这一崇高的名称。

于是，所有派别的非洲政治领导人联合起来，成立了全国行动委员会，推选纳尔逊·曼德拉来领导。他们计划，如果白人少数拒绝进行对话，便举行另一轮罢

工。斗争加强了。作为其中的一部分，纳尔逊·曼德拉被派往国外，主要是非洲国家，通知他国，促进全世界的声援。这是曼德拉唯一一次离开南非地狱，作为知名人士自由旅行。使命结束后，他重返种族隔离的险恶环境，但决心比以往更加坚定。这个时候，比勒陀利亚的统治者将折磨狱犯的酷刑合法化，从而使他们的人间地狱更为险恶，造成震惊人寰的“自杀”浪潮，自愿的……或是事出有因的。

在这非洲抵抗崇高行为的气候中，纳尔逊·曼德拉满腔热情地从事地下活动达17个月之久，好象他预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一直活动，直到有一天，一个告密者告发了他，他被逮捕，罪名是煽动反叛和在持有有效护照的情况下出国。

比勒陀利亚的审讯结果是判处5年强劳。他在单独监禁中服刑，这意味着每日23小时一人独处，缝制邮包。但是，他刚刚开始服刑便于1963年被提出狱，面临一次更为严峻的审讯：里沃尼亚审讯（里沃尼亚是约翰内斯堡的郊区）。罪名是破坏和颠覆。

纳尔逊·曼德拉再次变法庭为其讲坛。他的辩词反映了解放斗争的历史，是一种杰出政治理想的庄严宣言。他辩词中的一些部分感人至深，乃如最后的遗嘱的信仰的声明。

幸亏国际舆论的压力，纳尔逊·曼德拉及其6个同伴险免死刑。

因此，到今天为止，纳尔逊·曼德拉的一生可以分为两部分：26年为斗争作准备，接着42年的斗争。后一时期中，20年参与实际斗争，充满创造力和活力，22年在狱中渡过。虽然这些年月表面看来是消极被动的，但却是南非领导人对我们全大陆解放斗争的最重大的贡献。

简单回顾这不同寻常的生涯，我们可以说，纳尔逊·曼德拉首先是一个富于献身精神的人，是一个强人。

在相当程度上，纳尔逊·曼德拉与坚固的、充满活力的集体文化之根联系在一

起。当他讲到殖民入侵前的过去时，人们可以感到他对历史遗产根深蒂固的依恋。他有时津津乐道这段历史，不是为了促进其事业，而是因为回忆过去似乎是逃避可怕现实的唯一办法。“作为特兰斯凯的一个年轻村民”，他讲到，“我曾聆听部落的长者讲述白人到达前过去的好时光，那时，我们的人民在各酋长的民主统治下和平生活，在全国范围内自由迁徙，没有恐惧。那时土地属于我们……我们国家最初的非洲人社会的组织和结构令我神往，大大地影响了我的政治见解的形成。”

人们还听到纳尔逊·曼德拉哀叹种族隔离制度造成家庭解体，道德标准败坏。但是，这种态度并不意味着纳尔逊·曼德拉迷恋过去。对他来说，过去仅仅是激励他建立一个没有壁垒的开放社会的源泉。

这难道不正是这个恰巧非常谦卑的非洲英雄人物一生巨大力量的来源吗？这是一种自然的力量，因为它坚定地植根于现实和理想之中。这种力量使人联想起非洲巨河在汹涌澎湃的洪流中以雷霆万钧之势跌落峭崖、一泻千丈之际的伟力。

纳尔逊·曼德拉首先是个明智的人，他憎恶蛊惑人心的宣传。他断绝与马库斯·加维的激进民族主义的关系。激进民族主义可以总结为一句口号：“非洲人的非洲！”他说，“我们考虑我国的具体情况，我们懂得，必须保留各不同种族集团。”“条件是”，他紧接着补充说：“根除白人统治，改革社会基本结构，以便停止剥削和贫困。”

纳尔逊·曼德拉战无不胜的力量来自这一事实：他是个有一种思想、一个计划和一种信仰的人：以正义求自由。在比勒陀利亚的审讯中，他直接了当地宣布：“我痛恨种族歧视。人类绝大多数也憎恨种族歧视，这个事实使我仇恨倍增。法庭可能施以任何惩罚均无法熄灭我的恨火……我相信，后代会为我正名，会说，本应当出庭的罪犯正是维沃尔德政府的成员。”

因此，人们意识到这个人的领袖魅力，他是如此纯朴而又如此伟大；他坚定地把自已的信念变为自己的生活、良知和生命的一部分：他是一个从不违背自己信念

的人，宛如巍巍雄山，是世代演进的标志。因此，比勒陀利亚审讯的裁决宣布之后，一群支持者和旁观者不顾禁令，涌上街头，欢呼“Tschotscholola Mandela！（继续，曼德拉！）”

人的这些品质是领导者、尤其是法官和战略家的杰出气质开花结果的沃土。

纳尔逊·曼德拉的品质、他分析南非社会、政治问题的技巧以及他的恻隐之心的力量使他自然成为他的人民事业的倡导者，尤其因为他的职业是律师。他说，“不仅我的人民，而且我作为律师的职业以及我的争取普遍正义的愿望都使我认识到，抗议乃是我的责任所在。”在比勒陀利亚的审讯中，他抗议完全由白人法官组成的法庭，因为在谈到种族隔离时，他们既是判官又是当事人。

纳尔逊·曼德拉的辩词严谨无华，使其政敌无漏洞可抓。他为指控南非人民大会的共产主义罪名进行了出色的辩护，而未落入反共言论。他用无情的幽默和高尚的口吻既庄严又讥讽地指出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罪过。例如，他作为秘书长，代表非洲政治领导人发出一封信，要求召开一次国民大会。以下是他对信件发出后出现的缄默所做的描述：“在一个文明国度，政府如不承认收到这样一封信、甚至不考虑由该国最大社团的最重要官员和领袖组成的一个组织提出的要求，那么，人们认为此乃弥天大辱。政府的态度再次使人们对文明人的希望落空。”

以同样方式，这位善于力排惊风暴雨和僵局来坚持既定方针的战略家无与伦比地以其明晰主次目标、同盟、政策和各阶段的无瑕智慧坚持了自己的权利。他洞察一切的远见和以和平改良主义和暴力为自卫手段的灵活战略使他能够适应各种情况，战胜各种种族主义挑衅的邪恶。

他引述37年以来其和平反抗运动最初合法后被宣告非法的事实来证明转入秘密和破坏是合理的。这一和平阶段遭到的是大屠杀，并且被取缔。由于现实和良知都要求继续斗争，因此，再无其他选择。他说，“任何一个名符其实的公正的政治运动如果被一个剥夺其发言权的政府宣布为非法，都不会同意解散。”

纳尔逊·曼德拉为南非人民大会的军翼和民族先锋辩护时，严谨地提出自己的论点，突出四种形式的暴力行动：破坏、游击战、恐怖主义和内战。民族先锋是一个故意同南非人民大会分开的组织，这个组织初期采取的破坏行动是遭到种族隔离制度拒绝的早期和平主义政策与游击战甚至内战这种更直接的暴力行动之间的一种妥协，因为破坏行动针对经济目标，由不带武器的人进行，不造成生命损失。

为了避免第一种情况，即可能造成各种族集团间长期相互仇视鸿沟的类似沙佩维尔事件的残忍屠杀的扩散，以及第二种情况，即盲目的恐怖主义暴力行动，南非人民大会尽可能走非暴力的道路，在实现纳尔逊·曼德拉详尽描述的武装斗争的客观条件之前，进行“有控制的暴力行动”。

这位南非领袖面临被压迫人民的正当愤怒和炮制种族隔离思想体系以保护其肮脏利益的主人的凶忍残暴的双面夹击。纳尔逊·曼德拉牺牲了个人自由，但是，正如他的权威仅能使他控制人民斗争的进行，坚持短期内灾难越少就意味着长期的收益越大这一原则；他的声音在种族主义分子的无动于衷面前也只能是预言。

他宣布，“人民、我的人民，非洲人民已经在有意使用暴力反对政府，以期用政府唯一清楚知道和懂得的语言使其听从理喻。”等到纳尔逊·曼德拉这个预言家在比勒陀利亚的圣径中得到承认，也许就为时太晚了。简言之，纳尔逊·曼德拉的政治思想体系虽然受到“甘地、尼赫鲁、恩克鲁玛和纳赛尔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不同于共产主义者，他也承认西方社会民主的好处。再次引证他讲过的话：“我认识到，在我探求一种政治准则的过程中，需要保持绝对公正、客观。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舍此无他，但同时我必须思想解放，借鉴东西方的精华。”

他被逮捕12年之后，正如他预言的那样，乌云起，风暴来。那是1976年6月16日，在金城约翰内斯堡的郊区，一个有百万居民的黑人区——索韦托。种族主义政权无视学生和家长的抗议，决定将南非荷兰语作为学校的正式教学语言，

在此之后，学生骚动达到狂热程度。

南非荷兰语是一种陈旧、有限的语言，因其使用者拒绝向世界开放而未充分发展，这种语言意味着文化上的孤立。对于黑人来说，南非荷兰语主要被视为镇压的语言、产生种族隔离这一名词及其可憎概念的语言。因此，可以理解的是，那一天大批年轻人涌上索韦托街头，发出愤怒的吼声。他们试图进入奥兰多体育场，在那里举行集会。当警察发出第一枪时，暴乱的气氛顿时笼罩了索韦托。一个类似一队纳粹突击队员的特别分队被派往该市，卷入血腥对抗和破坏行动。年轻人高举象征黑人权力的拳头，接管了城市。1976年6月至1977年初期间，运动蔓延到其它中心。整个南非很快都变成了索韦托。学校关闭。两个阵营被长期动员起来，举行示威，凶恶的袭击、纵火、抗议游行、为镇压的死难者送葬、声援在该国其他中心进行的斗争。“没有一天人们不涌上街头与枪炮对峙”。死亡人数达1,000。这场悲剧的险恶结束语是，黑人觉醒运动的领袖史蒂夫·比科象几十名其他人一样，在狱中遭警察暗杀。

以上便是事实。这些事实使我们清楚地了解这一事件的实质和意义。

索韦托事件是南非境内第一次重大的民众反抗行为。从这个观点来看，这是一个质变：从镇压到开始广泛地攻击种族灭绝和民族灭绝制度，也就是种族隔离制度。这个事件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青年人的进入政治舞台。这些马路儿童，这些“脱缰之马”因为受到他们父母的压制，决定自作主张以行动代替语言，用的就是他们的镇压者的同一种语言。哎呀，用的是多么荒唐的手段呀！索韦托的青少年履行他们对非洲的誓言，首先吃子弹的牺牲者中有一个被认为是领导之一的13岁学童赫克托·珀森！接着是19岁的齐蒂·马希尼尼，然后是16岁的科特索·西特洛霍起而代之。这两人后来都因被悬赏捉拿而被迫流亡在外。但他们对新的领导方式都留有指示，经选举后由22岁的丹尼尔·莫特西西担任。

索韦托抗议的文化内涵特别重要。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索韦托事件是南非境内解放斗争的一个决定性阶段。实行经济镇压往往只会导致被压迫者的反抗，但

由于思考到一个人的文化传统从而产生政治意识却是出现真正的根本变革的证据。

从这个观点来看，索韦托事件所表现的是南非青年和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一种更深刻、范围更广的运动，并且也采取了若干美国黑人权力运动的观念。关于黑人教育的立法（班图人教育法）仅仅是种族隔离制度的一部分。它的目的是使黑人局限于文化无人地带，并且永远被贬入社会的下层地位。确实，布尔人本身就曾拒绝以英文作为他们的主要语文，现在却开始强迫黑人使用南非荷兰语。非洲青年宁愿象白人一样，或者使用他们的母语或者在英文和南非荷兰语之间选择一种。这种政策明白显示“分别发展”的伪善原则只有在白人占绝对优越地位，在这个情况下就是布尔人占优越地位的条件下才能设想得到。

面对着这种文化窒息威胁和对文化抱着一种灭绝态度的独裁主义制度，使黑人发展出一种《黑人意识运动》，特别是在1968年由黑人教师协会支持创立了南非学生组织以后。“拒绝接受任何旨在使黑人不能在他们的本土上做主人翁的价值制度。支持自力更生、自发自动和亲爱团结的意识以确保受压迫者的尊严”。这些就是上述运动的目标和目的。比勒陀利亚原教旨主义的种族主义者永远坚持世界的组成是二元化的：“白人或非白人”。后者因为他们不是白人而受到否定；通过残酷和人为的分割，他们活生生地被肢解为无穷无尽的组群和分组群：梅蒂斯人、印度人、班图人。在这些分组群内又再区分为祖鲁族人、科萨族人和索托族人等等。假使在这些上面再根据党派、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等来加以区分，则结果是四分五裂，对被剥削的组群是极为不幸的。因此，《黑人意识运动》的根本问题是：“我是谁？”正确的答复不是“我不是白人”；而是将所有被压迫的人归为黑人这一类，使“世界上不幸的人”联合起来，从而公开种族隔离制度的残酷种族主义并揭露阶级基础结构的真面目。

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受到剥削是因为我们是“黑人”，也就是说，我们是被排除在外、被蹂躏、被认为是低等的人。《黑人觉醒运动》渗透到索韦托的少数民族聚居点和其他地方，并通过在文化和社会活动（剧场、扫盲、新闻界、合作社、保健方案等）方面的互助、参与民众，帮助他们解决日常问题，使他们尽可能象白人一样的独立。

这就是索韦托儿童在突然进入历史舞台时所呼吸到的空气。他们摆脱了自卑感，这就解释了他们对抗巨魔的冲动和勇敢的行为。

但是，自然，索韦托事件的内情说来话长。法律、军事和警察力量都已加强，尤其是在1948年南非荷兰人国民党当权之后。1950年开始颁布了有关保留地区（本土）和种族定义的可恶法律。例如，白人的定义是“任何外表显然是白色人种的人……”。然后生硬地企图更改这个荒唐的赘述说“或是一般被认为是这样的人……”。

事态每况愈下。保留地成了班图斯坦（特兰斯凯、西斯凯、克瓦祖鲁、文达、夸夸等）。这些荒野的班图斯坦毫无经济前途，由国际上不承认的毫无权力的种族集团首领领导。事实上，班图斯坦是黑人入力的供应站。但是自1960年到1980年被遣送到这些悲惨地区的非洲人的百分比自40%增加到53%。

南非境内现在仍然在感受到索韦托动乱的影响。首先，斗争已变得更激进。在非洲社会里，子女是很受到珍视的，因此残酷野蛮地损失了数十个儿童烈士，“屠杀无辜”，是真正的导火线，这个打击往往使人怀疑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基本战略。

一位南非诗人愤怒地写下了这些字句：“唉，1976年，你已经战败了！我们不敢再向你炫耀吹嘘。烽火之年！灰烬之年！……”。《索韦托儿童》的作者姆布勒索·姆扎马内写道：“我们对这次斗争缺乏准备。我们所有的只是士气！”但是，这种由于青年人直接采取行动所产生的高度警觉实际上难道不是索韦托的一项成就吗？事态永远不会回复以往。起来站在前线反对种族隔离的青年人永远不会再回头：在叫他们回学校时，他们回答：“我们将在自由的南非境内学习”。

在一连串迄今建立的新优先事项中，正在对父母施加压力，要他们参加或跟随罢工。

如有背叛的情况发生，必定会采取惩罚行动、焚毁房舍、处决一些人。暴力行为有自食其果的后果。

索韦托事件的另一项重大收获是使斗争在群众中扩大并伸延到所有的社会阶层。

妇女已经参与一切斗争。在第一次大战前夕他们曾在自由橘省举行示威反对通行证。有些妇女曾因为他们的活跃和不惧危险而出名。例如琳达·姆特瓦纳、

莉莲、纳戈伊、伊丽莎白、马凯芬，不用说还有全世界都钦佩贺扬的温尼·曼德拉本人。

这些勇敢的妇女知道他们的儿子正在被拷打并且往往晓得他们将会被处绞刑。这些妇女虽然丈夫在世，但过的却是寡妇般的生活，因为他们每年只可以短暂地重聚一两次。她们从事佣人和保姆的工作帮白人照看孩子，直等到有一天看到他们自己的孩子奄奄一息地回来，由于从事工业劳力而筋疲力尽地象垃圾似的被送返保留地。

至于说到工会，它们曾大力组织索韦托运动。1979年，种族主义政权为了要控制工会而不得不使它们合法化。数万工人涌进这个打开的缺口，自此，工会会员的人数每年均增加50%。1983年，全国煤矿工人工会在一个雇有500,000名非洲人的部门成立了，这些工人中五分之四都在全世界最富有的金矿工作（每年出产纯金500至1,000吨），但是自1911年以来却有44,000名工人死于其中。1984年开始，劳工工会、学生运动和政治运动之间的团结已导致轰动的罢工和社会动乱的爆发。南非的经济机构已经喘不过气来了。资本因为国内市场不够大而正在被送出国外。这是由种族隔离制度本身直接引起的结构上的矛盾；这个制度只要单凭阻止大部人口取得某些很矛盾地又是经济扩张所必需的技能，就已经保证大部分人口的购买力都过低。种族隔离是既无利益可言而又缺乏生存能力。这个制度是不合理的因为资本主义市场不能顺应这种所谓分开发展的壁垒。

至于各个教会，它们长期采取消极的态度，同时表面上口头敷衍地谴责种族隔离制度。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索韦托事件发生以后，它们大部分都很明显地同南非制度疏远，例如，在教会学校里废除种族隔离。唯有南非荷裔人改革派教会仍然胆敢支持白人当局。另一方面，各独立黑人教会则相当正确地反映它们社会环境的各种选择，其中最强大的教会有5百万教友。

这一位我们总有一天会见到的当代巨人，他光辉崇高的人生要求我们采取什么行动呢？索韦托的精神和斗志昂扬的行动迫使我们必须采取什么行动呢？除非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感召，超越我们平凡而确实是渺小的生存，则思念英雄们的人生是毫无必要的。

我们自纳尔森·曼德拉的人生得到的教训中，有一项就是拒绝以个人主义来作为非洲灾难的对策。纳尔森·曼德拉是真正典型的“有机知识分子”，他已与他的人民认同而这些人民也已与他认同。他的心目中毫无今天破坏许多非洲社会的个人主义。在过去，是团结一致使我们人民能生存数千年。在已往各村落和各种族集团的这种团结正在逐渐分化和转变，而我们又尚未取得全国性的团结之际，必须认为腐蚀性的个人主义是反非洲文化的。

但是，和这种个人的个人主义同时并存的还有另外一种我形容为集体的个人主义可能甚至会为害更大。这就是一些利益集团及一些鼓吹超越合法防卫本身的经济利益或意识形态的想法，表现自私剥削或狂热排他精神的集体个人主义。它们忘却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能够在尊严和自由的情况下生存在一个不同情弱小民族，也不同情因意见分歧而陷于四分五裂的民族的世界里，并且继续取得发展。

自纳尔森·曼德拉的人生可以吸取到的第二个教训就是永远尊重我们民族的集体尊严，顽强地拒绝接受下等或卑劣的地位。这就解释了他为什么痛恨利用劣等教育、限制只能从事下级或仆佣工作和限制工会的权利等手段来阻止黑人提高他们的地位的种族隔离制度。曼德拉曾说过，“南非境内最卑下的工作必定是非洲人干的。如有任何物件需要搬运或清洁，白人必定找非洲人去做而不管这个非洲人是否是他所雇用的。”有一个种族隔离的领袖甚至曾经说过：“黑人除了开卡车或削马铃薯皮外永远不会有其他成就。”虽然我们独立的非洲国家可以吹嘘地说在我们的国家里这类对我们种族歧视或隔离的情况现在已经成为过去，但我们必须仍然问一问我们自己，这类不平等或种族隔离的状况是否已经转到南北的关系上去了。我们必须永怀争取民族尊严之心，并且永远研讨如何使其实现的途径。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谋求统一是我们可以从纳尔森·曼德拉的人生吸取的第三个教训。为了谋求统一他拒绝接受班图斯坦这个观念，因为这些宪法规定的黑色保留地正在逐渐削弱黑人民族对抗它们的共同迫害者的力量。

不过就是这种渴望统一的意志解释了为什么曼德拉坦然接受白人作为南非的公民、接受民主的白人作为可能的盟友甚至也许作为本党的同志。

事实上，许多比较有人性和比较有知识的白人，特别是那些加入温尼·曼德拉的友人海伦·苏兹曼的进步联合党的白人，他们已经参加了非洲爱国人士的一些行动。黑带运动的妇女们安排了援助那些被逐出境和被判刑人士的家属的工作。有些白人甚至死于狱中，而其他有些人则被逐流亡。

曼德拉认为接受改革派白人的联盟既不表示是启发德性的人道主义也不是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弱点，而是一种战略目标和信心的表白。他明白，经过最后分析，克服种族主义的途径并不是采纳另外一种种族主义的教条而是要超越种族主义。这位南非领袖曾说：“非洲人要和他的妻儿在一起，居住在他們工作地点的附近。非洲人要有在晚上11点以后外出的权利和在他們自己国家中旅行的权利。非洲人要享有南非财富的一部分。不过”，他又说，“南非人民大会已经与种族主义斗争了半个世纪。它取得胜利时将不会改变政策的。我曾反抗白人统治而我也曾反抗黑人统治。我选择民主和自由的社会作一个理想的社会……”。南非人民大会一向将非洲统一列为其政治纲领的一个主要项目。象今天这个世界照这样的事态发展，我们的真实地位和保护我们利益的最低限度，总的来说，我们的尊严，将直接取决于数百年来不由我们置喙而建立起来的力量对比中我们力量的比重。我们必须团结否则只有被征服。我们必须团结否则就会灭亡。这是我们必须面对困难境况，因为只要我们胆怯地退缩到别人给我们划定的界限内，则每一个非洲国家必将成为常年求助的乞丐而永远无法独立。

先生女士们，亲爱的同胞们，经过最后的分析，纳尔森·曼德拉一心一意进行

的伟大斗争并非如国际法所界定的是一种异族的斗争。这是黑人为争取其作为各种力量之一的历史地位而进行的漫长斗争中的一个决定性事件。这就是使我们集体生存发展有生气的原因。纳尔森·曼德拉也是我们的领导者！

里冯尼亚审判后，热血沸腾的非洲群众高举上书“只要我们活着你就不会服刑”的旗帜的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我们所有非洲人必须发誓和重复的誓言。不！纳尔森·曼德拉和他的同志必定不会，也不可能死在狱中。

当然，在政治上来说，他们已经经由历史的大门离去，而现在他们必须实际上真正离开。

比勒陀利亚政权必须赶快退出，因为倒数已经开始。非洲有一句格言说：“变色龙只要不被追赶，它就大摇大摆的象个国王。”目前历史发展的加速步伐甚至导致比勒陀利亚历来最强大的联盟，商业界也开始同南非人民大会进行谈话；我们希望这种发展会在尚可挽回的时机内克服南非种族主义者的自杀性顽固态度。

这就是为什么在遵循曼德拉的人生伟大说明的政策把他释放以前南非是不会平静的。

整个非洲必须动员进行这场标志着非洲历史转折点的斗争。白人少数没有合法权力来统治和奴役黑人。他们也没有只能根据虚假神学理论而建立的神圣权利，也没有以较高的智商为根据的天赋权力；因为以曼德拉的政治颖悟来和皮得·博撒相比是对纳尔森·曼德拉的一种侮辱。白人也没有最初居民的权利，因为考古研究显示非洲区域自无从追忆的时代开始就有人居住。他们又没有民主的权利，因为占人口73%的黑人只拥有13%的土地（最贫瘠的部分）和25%的国民所得，而占人口15%的白人欲占有87%的土地和75%的国民所得。根据国际法白人也没有权利，因为南非轻视和公然违抗国际社会，所以套用克瓦梅·恩克鲁马总统的话来说还不如称其为“国际罪犯”。

所以剩下所有的只是强权的“权利”。怎么会是别的呢，因为丁·斯特黑杰

多姆先生在1942年曾形容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确实与我们本身的哲学最接近的哲学……”。今天，南非荷裔各党各派比皮得、博撒的公开表明信仰纳粹主义更右，而当权的人完全实行这种政策，最后的结果更坏因为这种罪行还加上虚伪。

种族隔离是一个癌症，它已扩散到社会机体的每一部分并已严重伤害远离其起源点的各处。象一条垂死的蛇，就算只对邻近的国家例如非法占领下的纳米比亚而言也比以往更危险。

至于各前线国家，它们的负担已远远超过其应负的共同负担份额。它们值得非洲和全世界的感谢。它们之中有些在经济依赖与军事颠覆之间彷徨，仍然面对痛苦的抉择，不过它们都明白，为了防止经济班图斯坦的发展，不是一切都可以妥协的，因此国际对它们的声援是很重要的。

剩下我们这些是，或者自以为是远离好望角、比勒陀利亚和约翰内斯堡的人又如何呢？我们千万不能绝对认为我们远离种族隔离政权之患。只要具备攻击力量而又能使本大陆很大一部分地区无能为力的这样一个政权仍然掌权，就没有一个非洲国家能够感到安全。

不过，恐惧不该是我们的动机，恐惧以外还有责任的问题。我们必定不能有负于阿扎尼亚的前途。阿扎尼亚无疑地必将成为本大陆的最强国，甚至是一级世界强国，因为它是世界上黄金和钻石的最大产地，和第二大铀矿出产地，并且因为它拥有全世界锰矿矿藏的81%、白金矿藏的72%、铬矿藏的58%和黄金矿藏的49%，不用说它还控制50%的非洲工业产出（75%的钢、57%的电力、87%的煤和56%的铁路交通）。就象詹姆斯·马修士在《无时寻梦》中所书“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推诿搪塞的时代已经过去，正如西福·西帕姆拉在《我热爱的索韦托》里所写的，他对白人说：“停止你们的谎言”，“停止好似大风不肯让它们静止的胡言谩骂。”

然而，倒数已经开始。1986年将是真理之年，就是种族隔离必须宣告破产之年。我们欢迎任何国家行动和国际行动，这些行动也许可以——通过对南非的爱国志士提供全面援助，或通过呼吁、警告、施加压力、制裁、撤资等——说服或强迫比勒陀利亚政权改变或面临崩溃。

我们深信，各民族解放运动，诸如南非人民大会、泛非人民大会、青年人、妇女、非洲工会、各种阵线、特别是联合民主阵线，连同它们一千个左右的成员组织，当它们见到必然出现的曙光终于照耀在地平线上时必能继续负起它们的责任。

在这个国际青年年里，我们呼吁所有非洲青年慷慨激昂地步英勇的索韦托儿童的后尘，通过他们的团结，全心全意致力于这个崇高的斗争，在南非建立一个多种族的民主、和平和繁荣的社会。

对于比勒陀利亚政权和为了延迟过程的进展或为了剥夺我们弟兄们付出极大代价而取得的胜利成果而意图插手干预的各方，我们诚恳的说：“放过阿扎尼亚的非洲人民吧”——沙普维尔、尼扬加和古古莱图的人民，兰兰加、里沃尼亚和亚历山德拉的人民，克万纳布赫勒的人民，勇敢的索韦托人民！

不过，虽然曼德拉的人民是由这个铁模型中铸造出来的，这是不足为奇的，而更明显的是，只有这一类人民才能产生象曼德拉似的领袖。

是的，同坦克对抗中，赤手空拳的孩子们终将在现在有人甚至想重新将它命名为绝望角的好望角里占到上风。

但是对纳尔森、曼德拉、对所有非洲人、对所有善良的人来说，“良好的希望”仍然是有的。当然，我们并非试图使纳尔森、曼德拉成为个人崇拜的对象。他自己也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说：“有人以为我们人民所取得的进展、偶而取得的成功以及在国外赢得的承认多少都得归因于我的努力。我必须说，我不过是一条锁炼的一个环节而已。这种进展不仅是由于我的努力，而是由于我的同志们和我自己在此地和在国外所进行的集体努力。我很幸运，在我的政治生涯中，始终得以

同可以得到非洲人爱戴和尊敬的能力高强而又能对自由事业作出贡献的同志们一起工作。”让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纳尔森·曼德拉的战友，特别是目前流亡在外的奥利弗·坦博，和那些还没有看到人类的新时代的黎明就已在斗争中牺牲的志士。尤其重要的是，让我们不可忘记今天的最重要的战士——南非人民。然而，有时候一个事业和某一个人的名字会成为不可分离，以至最终成为二而一，不分彼此。

1984年，为了奖励对民族解放和民族尊严的杰出贡献和历史性贡献而设立的西蒙·博利瓦奖由教科文组织首次颁与纳尔森·曼德拉和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共同接受，因为他们帮助受到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其中最邪恶的形式之一就是种族隔离——祸患摧残的国家恢复自由。今天，对纳尔森·曼德拉的赞扬无可计数。另一方面来说，假若要送一个大麻疯到以前由麻疯病院占领的罗班岛去，要送的就是种族隔离本身。最近在伦敦树立了一座纳尔森·曼德拉的塑象，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培养他在我们心目中的重大形象。希望达卡境内这条伟大道路的名称永远提醒我们这一点。

在南非境内，甚至是在今天，有时为了在搜查时不被警方找到这位南非历史性领导人的著作而将它们掩埋在花园里。然而非洲和全世界都已经对曼德拉作出裁决，宣判他无罪并且对他赞美颂扬。

自壮丽的阿特拉斯山峰到德雷肯斯山的悬崖绝壁，自佛得角的海岸到非洲之角，荡漾着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呼声，我们泛非人的呼声：“永远祝福你和崇敬你，纳尔森·曼德拉！”

-----